

#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从下往上看”的人民主体思想探析\*

乔瑞金 胡欣宇

**[摘要]**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以实现科学社会主义为目标,围绕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革命主体的建构、反抗资本主义的实践策略、革命斗争的现实路径等核心问题展开持续探讨,逐渐形成了具有英国特色的“从下往上看”的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理论,并呈现出显著的发展特色:一是弘扬优秀文化,重铸工人阶级革命主体的阶级意识;二是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增强工人阶级革命主体的战斗力;三是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盟,提升工人阶级反霸权革命斗争的能力。他们的不断探索构建了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更具包容性和能动性的革命主体理论,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和社会发展贡献了力量。

**[关键词]**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 人民主体 意识形态

面对全球化进程加速、技术进步和世界市场一体化的历史嬗变,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如何构建起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以实现社会秩序的根本性变革,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思考和解决的关键问题。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内,无产阶级被预设为实现社会历史变革的革命主体力量,其合法性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构性矛盾。然而,这一命题隐含着潜在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张力。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将无产阶级定义为“资本主义掘墓人”,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社会成员的客观经济地位而从革命潜能方面作出的论断。但是,革命实践的真实发生,需要对主体的潜能进行激活。面对新的社会现实,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以实现科学社会主义为目标,以“从下往上看”的人民主体理论为核心,不断探寻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革命主体力量的激活方式,将马克思主义与英国本土实践相结合,持续探索在资

本主义新的统治形式及复杂局面下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行策略,形成了具有英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理论和实践路径,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主体生成条件的理论思考边界,提升了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战斗力和反霸权的能力。其理论探索对于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目标,具有现实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 一、弘扬优秀文化,重铸工人阶级革命主体的阶级意识

二战后,随着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消费主义以及后工业经济的崛起,英国社会发生着深刻的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英国马克思主义百年资本主义批判思想史研究”[项目编号:23&ZD017]的阶段性成果。

结构性转型,传统工人阶级的物质基础和组织形态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工人阶级内部的异质性增强,阶级边界模糊化,加之资本主义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霸权式控制,导致传统的阶级斗争模式难以维系。在此背景下,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从唯物史观关于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一思想出发,敏锐地意识到,需要突破“经济决定论”的单一的僵化思维框架,重新审视文化维度在阶级意识形成中的能动作用,弘扬工人阶级长期以来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激发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意识,为英国工人阶级寻找新的解放道路,以回应现实背景下英国社会主义革命面临的危机。

### (一) 必须重新确立工人阶级文化的性质,唤醒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无产阶级被认为能够认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颠倒为物与物之间关系的颠倒逻辑,进而识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与霸权性,自觉承担起消灭剥削、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增殖运动促使资产阶级施展其“完美”的管控技艺,对工人阶级的生产、生活甚至生命过程实施全方位控制。经济上,大型企业和组织占据主导地位;管理上,实行泰罗制以及严格的科层制;分配上,实行凯恩斯主义;同时,鼓吹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资本主义固有的内生性矛盾看上去得到暂时缓解,工人阶级的物质及精神需求暂时得到初步的满足,其“构成方面发生了许多根本性变化”<sup>①</sup>,从而使工人阶级队伍“集体意识降低和组织性、反抗力下降”<sup>②</sup>,社会主义运动随之陷入低潮。工人阶级在这一过程中被置于一种客体化的境遇中,失去了对自己劳动过程的掌控。同时,通过对消费主义等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鼓吹,资产阶级逐渐构建起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文化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工人阶级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与价值观念的形成,促使他们将生活重心转向个人享乐与物质消费的满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他们对集体利益的维护和对社会正义的追求。

面对这一历史变化,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仍然是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因此,必须尽快恢复其作为历史主体的阶级意

识自觉。一方面,他们不同意庸俗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主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本质,在重申物质生产逻辑优先性的基础上,将之动态化和实践化,强调主体和意识在构建与改造客观世界方面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他们秉承唯物史观的革命主体思想,强调阶级意识是工人以文化方式处理自身经历的结果,而不是简单地从经济条件推导出来的,因而主张弘扬工人阶级的优秀文化并将之重塑为社会变革的核心力量。他们认为,英国工人阶级不是被动接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对象,而是积极主动的社会群体,通过自身的实践和斗争,英国工人阶级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和政治意识,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他们也不满于利维斯主义主张通过阅读经典文学作品及精英群体的影响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认为利维斯主义是“要维持现有秩序”<sup>③</sup>。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爱德华·汤普森等人以唯物史观为思想基础,从“文化主义”“经验主义”视角,积极探索适合英国历史与文化传统的革命战略与策略,认为英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工人阶级主体意识的异化与同化,个体被大众文化构造的虚假图景所蒙蔽,成为服从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被动存在。因此,必须通过重铸工人阶级文化,重新挖掘其中内生的批判力和进步力量,从而推动社会秩序的变革。他们批判了当时广泛存在的“精英决定论”,认为革命意识不再是缺少代表性的精英分子的专属品,主张推动历史进步的核心力量存在于下层社会中,并在坚持经济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强调了文化领域及个体经验在推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

在霍加特看来,大众传媒为赢得无差别的受众,总是费尽心思地模糊阶级差别,致使工人阶级在大众文化的强烈冲击下失去自身阶级文化中的积极因素,难以察觉到文化繁荣表象背后潜藏的文化压迫,陷入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收编”的危

① [美]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方生、朱基俊等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13页。

② [英]哈迪、[英]库拉纳:《新自由主义与英国工人阶级》,张番红、刘生琰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6期。

③ Francis Mulhern, *The Moment of "Scrutiny"*, Schocken Books, 1981, p. 322.

机,而“文化从属地位的锁链比经济从属地位的锁链戴着更容易,斩断则更难”<sup>①</sup>。对此,霍加特认为,必须反对精英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文化观,唤醒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自觉。他提出,工人阶级文化具有内生的创造性,它“不单单是一种消极反抗的力量,也是一种积极的东西,工人阶级具有一种很强的在变革中生存的天然能力,他们适应或接受新事物中他们想要的东西,忽略其余的东西”<sup>②</sup>。在政治诉求上,他批判了二战后英国“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政策,认为其侵蚀和破坏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导致工人阶级被逐步整合进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之中,工人阶级原本具有的激进变革潜力也因此被削弱甚至消解。基于这一判断,他认为,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复兴,必须提出新的理念与战略。为此,霍加特主张,立足英国国内现实,坚持文化唯物主义的立场,突破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通过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挖掘和弘扬,探寻其中内生的批判性因素,从而推动社会秩序的变革,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 (二) 必须重新定义文化,确立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核心地位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从具体经验出发,扩展了文化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强调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能动作用及其相对的独立地位,认为只有承认并重视文化的创造性和相对自主性,才能更全面地理解社会变迁的动力机制,重塑工人阶级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地位,激发其参与社会变革的积极性。汤普森将历史唯物主义与英国的激进传统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广泛影响的“从下往上看”的人民主体理论。在深刻批判斯大林主义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僵化理解的基础上,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及其关系的解释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理论认识,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曾经存在过的东西而提出的一种独特隐喻。<sup>③</sup>但苏联教科书体系却将这种隐喻解读为“半自动化且独立于有意识的人类行为的机械模型”<sup>④</sup>，“忽略了主体性和意识在创造性劳动和社会斗争中构造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关键作用”<sup>⑤</sup>。因此,必须重新认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倡导开放、灵活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激发工人阶级的革命自觉。汤普森强调,“阶级意识在阶级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工人阶级可以通过传承前辈的文化及自身的斗争和实践,形成独特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sup>⑥</sup>在他看来,民族文化的丰富性是塑造集体意识、推动社会变革的能动力量。而英国工人阶级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反抗资本主义剥削、克服自身异化的潜在力量。在英国工人运动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互助组织、工会斗争经验以及各类节庆仪式等实践,不仅延续了前工业时代的集体主义基因,构建了英国工人阶级独特的情感结构和文化认同,更在与资本主义的碰撞中激发出新的阶级意识与革命潜能,为革命主体力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威廉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英国文学批评传统相结合,开创了具有非还原论特征的文化唯物主义解释范式。他认为,文化不应被简单地视为社会结构或经济基础的被动反映,而应被视为理解社会变革与政治实践的关键领域。在他看来,文化是“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sup>⑦</sup>,是“民有和民享的存在”<sup>⑧</sup>。文化研究立场的这一转变,一是重申了阶级在社会变革中的核心地位。当时有人认为,工人阶级正在迅速消失,并被新的无定形的中产阶级人口所取代。威廉斯提出了反对这种观点的有力论据。对他来说,阶级仍然是一个核心问题,阶级差异体现在不同的世界观中。二是将文化拉下神坛,文化不再是束之高阁的精英阶层的专有物,统治阶级或其知识分子雇佣军不再是文化的压倒性来源。这就打破了精英主义的文化观,重新确立起工人阶级在文化政治实践中的地位。三是不再将文化视为经济基础的附属物,而是社会整体结构的构成物。这就打破了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僵化理

① [英]霍加特:《识字的用途:工人阶级生活面貌》,李冠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35页。

② 同上书,第31页。

③ E. P. Thompson, “Socialist Humanism: An Epistle to the Philistines,” *The New Reasoner*, No. 1, 1957.

④ Ibid.

⑤ [英]谢克特:《从马克思至今的左派史》,魏南海译,重庆出版社2021年版第45页。

⑥ 乔瑞金、师文兵:《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的主导意识》,载《哲学研究》2005年第2期。

⑦ [英]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

⑧ 乔瑞金:《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对文化概念的哲学分析》,载《理论探索》2008年第3期。

解,使文化具有了自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取消了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绝对划分,将文化视为社会变革的核心领域。四是将文化视为整体生活方式,强调文化是活生生的经验,从而恢复了文化的可感性,“把文化研究看作对整体生活方式中不同元素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必要用能动的思想取代有关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公式”<sup>①</sup>。威廉斯强调了文化中主动和有意识的意义创造过程,注重经验的社会性和历史感。

通过对文化的重新定义,威廉斯、汤普森等学者扩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解释空间,确立了文化研究的合理性,突显了文化在政治解放和社会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强调了文化领域对革命主体阶级意识觉醒的价值和意义,为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理论空间。

### (三) 强调阶级力量在社会秩序变革中的重要价值

在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的进步只有通过工人阶级的斗争才能实现,而只有重新确立工人阶级在文化政治中的主体地位,工人阶级革命才能成功。汤普森认为,阶级斗争是在具体的文化存在中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工人阶级形成的前提条件,但文化传统也对阶级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阶级意识“总是处于具体的文化传统中,并且通过这种文化传统发挥作用”<sup>②</sup>。工人阶级的文化传统不仅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还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们的集体认同感和反抗精神。对阶级的分析应置于共时性的共同经历中,将文化视为阶级形成的重要领域。汤普森认为,阶级觉悟并不是由“党团派系、理论家”灌输而来,而是在漫长时光里自我形成的。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追溯了英国工业革命伊始工人阶级文化及意识的逐渐形成过程,同时强调了工人阶级组织力量的重要意义与价值。他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工人阶级的形成不仅是经济史上的,而且是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事实”<sup>③</sup>,“将阶级斗争从工作场所扩大到文化研究领域,文化研究自此被认为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主题,如罢工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sup>④</sup>。

在英国社会发生“无阶级感”危机之后,如何解决英国工人阶级意识淡薄的问题,如何重燃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以推动英国社会的秩序变革,

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对此,他们将工人阶级文化视为革命进程中的关键因素,强调它在抵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唤醒阶级意识和推动政治变革中的核心作用。他们在文化层面强化对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的正确理解,通过把文化定义为整体生活方式来突出阶级斗争的重要意义,并升华工人阶级的历史感。同时,他们指出,目前大众文化遮蔽了工人阶级文化本来的批判性与革命性,因此,必须恢复其主体意识与阶级能动性。由此他们通过恢复阶级研究的视角,重新确立了工人阶级文化的性质,明确了工人阶级在社会变革中的主体地位,并通过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辨析,重新定义文化,明确文化领域在社会结构中的核心位置,恢复工人阶级文化的社会主体地位。这一历史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成功拓展了文化研究的范畴,将文化从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僵化理解中解放出来,打破了精英主义的文化分层,强调工人阶级的文化及经验在社会构型中的积极作用,并为理解工人阶级的文化能动性、抵抗策略和主体性重构提供了框架,为新时期工人阶级的社会运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

## 二、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增强工人阶级革命主体的战斗力

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内部由于经验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的纷争出现了分裂。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对工人阶级主体性的呼唤并没有促进英国社会的变革,反而使资本主义的统治深入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佩里·安德森等学者认为,英国特殊的历史及革命传统使之缺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也缺乏进行这种革命所需要的理论体系的建构,从而使之越来越

① Raymond Williams, “Literature and Sociology,” *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 Selected Essays*, No. 3, 1980.

② 张亮:《阶级、文化与民族传统——爱德华·P. 汤普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86页。

③ [英]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册,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211页。

④ Colin Sparks, “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Marxism,” in David Morley & Kuan-Hsing Chen eds.,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Routledge, 2005, pp. 76-77.

难以形成实际的激进斗争策略,难以实践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难以进行社会和政治的变革。在他们看来,“文化主义”研究范式过于强调经验的重要作用,缺乏分析和批判的整体性维度,很难形成变革社会的合力。马克思主义应成为“一种普遍的科学”,其发展需超越英国的民族性框架,摆脱地方经验主义的狭隘性,创造科学的理论和革命实践。

### (一) 引入新的理论分析方法,促进英国本土革命理论的生成与革命主体的建构

自安德森担任《新左翼评论》主编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大量译介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结合前期文化主义、经验主义的研究,积极吸收适合自身的理论成果,重新探讨文化与革命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现象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文化研究在寻找另一种问题的解决方法时所涉足的领域”<sup>①</sup>。在这一过程中,“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理论适应当代条件,需要一种全新的观念。阿尔都塞的作品代表了科学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方法”<sup>②</sup>。这一理论强调科学性和抽象性,坚持结构性的因果关系,实现了对“经验和文化的去中心化”<sup>③</sup>。

这一新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框架将经验以及拥有这种经验的人类主体视为经济、意识形态等运作的结果。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历史生活的一种基本结构”<sup>④</sup>,任何阶级“主体”都不能先于其意识形态的召唤而存在。他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决定作用及意识形态在塑造社会主体中的重要性。这种理论从“多元决定”概念出发,认为社会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由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相互联系的不同层次构成的,每个层次都具有相对的自主性,社会的发展是由这些不同层次共同作用所推进的,而不仅仅是由经济机械决定的,经济的决定作用不能与整个社会的结构割裂开来。

### (二) 秉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协调社会结构和社会主体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规律是客观的,主要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而工人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其革命主体性源于对自身受剥削境遇的认知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马克思指出:

“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sup>⑤</sup>他强调工人阶级的革命使命与社会发展规律的内在统一。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具体分析了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状况如何成为其革命意识的客观基础。安德森在客观分析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基础上认为,“主体与结构”问题是“解释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问题”<sup>⑥</sup>,必须把工人阶级置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构中进行分析。一方面,他提出,社会变革最根本的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其中就包含着阶级之间的冲突与斗争。另一方面,他强调了社会主体的能动作用,认为“阶级斗争仍然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矛盾的根本方式,在社会秩序的颠覆和变革中,生产方式和阶级力量是相互作用的”<sup>⑦</sup>。他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进步就在于打破这种僵局,确定根植于历史的具体的经济生产形式之中的特定社会力量的地位。”<sup>⑧</sup>安德森认为,当前英国工人阶级运动陷入低迷的原因,一方面是未能深入剖析社会结构和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机制,导致对社会变迁和社会矛盾的理解不够全面;另一方面是没有充分理解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的社会的辩证运动,限制了工人阶级在现有社会框架内识别并利用矛盾来推进自身利益的能力,使工人阶级难以意识到自己的集体身份以及与资本家之间的对抗关系,难以形成变革的集体合力。<sup>⑨</sup>因此,重

① Anon,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Report: 1969. 7 - 1971. 12*,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1972, p. 5.

② Ben Brewster, “Introduction to Althusser,” *New Left Review*, Vol. 41, January/February, 1967.

③ [英]霍尔:《文化研究:两种范式》,孟登迎译,载《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

④ [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2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14页。

⑥ [英]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

⑦ Perry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Verso, 1980, pp. 55 - 56.

⑧ [英]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第133页。

⑨ Perry Anderson,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New Left Review*, Vol. 23, January/February, 1964.

要的是找到唤醒阶级意识的战略,推动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及“总体”意识的觉醒,使之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构成性矛盾及其自身的历史处境与阶级使命,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走向崩溃以及新的社会必然来临,由此产生与资本主义社会彻底决裂的革命的阶级意识,触发激进社会变革的可能性。

### (三) 从整体性社会生产方式角度,重新定位意识形态,赋予意识形态更丰富的含义

在特里·伊格尔顿看来,意识形态的观念既是对物质决定论的拒绝,又是对精神自主性的排斥;既是物质生产的产物,又是其参与要素,也就是说,它与物质生产共同参与社会生产,具有生产和创造性的功能。虽然意识形态在根本上由经济基础决定,但这种决定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因为“生产方式不会自己指定一种政治制度、文化形态或社会观念”<sup>①</sup>。意识形态不仅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反映现实世界,揭示社会结构与社会权力的关系,同时作为构成要素参与社会结构和社会权力的生产与再生产。

伊格尔顿认为:“意识形态并不是一套教义,它指的是人们在阶级社会中完成自己角色的方式,也就是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社会职能上并因此阻碍他们真正地理解社会的那些价值、观念和形象。”<sup>②</sup>他指出了意识形态生产的复杂性,强调了意识形态与权力的关系,重申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他进一步认为,“文化是政治的解毒剂”,应该对意识形态进行宽泛的理解,既不能将意识形态等同于政治,又不能消除意识形态的政治维度。他将意识形态的理解与现实政治及社会生活联系起来。同时,伊格尔顿批评阿尔都塞在理论上忽视了个体意识的作用,强调个体主体的能动作用,认为被统治的个体也蕴含着积极的反抗力量。

### (四) 重新分析文化的定义与作用

作为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推动者,斯图亚特·霍尔的研究范式在借鉴了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与意识形态理论后也发生了重要转变,主要探讨文化生产的意义与功能。霍尔声称,阿尔都塞的作品代表了“一场巨大的理论革命”<sup>③</sup>,并且“不可能在阿尔都塞派干预的持续影响之外思考文化或文化理论中的辩论”<sup>④</sup>。然而,他并没有

成为一个阿尔都塞主义者,而是借鉴符号学的原理来解释和理解文化。他认为,文化是通过语言来传达意义的符号系统,是意义的表征和获得;语言是意义表达的中介,通过文化和语言的作用,意义才得以生产和循环。意义不是被发现的,而是源于积极的生产和建构。霍尔说道:“由此,文化就被构想成了一个原初的构造的过程,在形成各种社会问题和历史事件方面,其重要性不亚于经济 and 物质基础,它已不再单纯是事件发生以后对世界的反映。”<sup>⑤</sup>他试图超越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反映论,反对唯心主义的主观意向论,以此发展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是整体生活方式”的思想。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倡导回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主张。他们强调,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涵盖了社会、文化、经济等不同层面,因此,必须采用总体性的科学批判才能实现社会的全面解放。通过这种总体性的视角,可以更加准确地辨别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及其动态变化,从而为制定有效的革命策略提供理论支撑。他们指出了社会结构中实践的“特殊性”和“自主性”,将社会结构视为“结构化的总体”,使我们能够理解“特定实践(围绕不同时间、地点和情境产生的矛盾)如何能够被整合在一起”<sup>⑥</sup>。在如何激活主体的革命意识方面,他们特别强调尊重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性,认为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深化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认识,这是增强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能动性的前提。此外,他们认为,文化不仅是经验的表征与再现,也是构成经验认知的意识形态前提。在这一视角下,文化成为塑造社会意识和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明确具有了培育革命主体和提升革命战斗力

① [英]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等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118页。

② [英]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页。

③ 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1983: A Theoretical History*,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126.

④ Ibid., p. 114.

⑤ [英]霍尔主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页。

⑥ 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2, No. 1, 1980.

的政治介入性,能够在尊重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增强工人阶级革命主体的战斗力,发挥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

### 三、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盟,提升反霸权革命斗争的能力

20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传统工人阶级政党的改良路线失效。新社会运动和身份政治逐渐兴起,促使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将革命视角扩展到边缘群体与微观政治领域,并试图在文化领域开辟新的抵抗空间。他们指出,资本主义的压迫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还体现在种族、性别、性取向等方面。左翼如果想要发起反霸权挑战,就需要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而不仅仅在经济层面,构建最广泛的联盟。因此,革命的主体力量也不应局限于产业工人,而应包括知识分子、女性群体、少数族裔等多元社会群体。

#### (一) 吸收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将其作为构建革命主体和现实革命路径的突破口

继“文化”和“意识形态”概念之后,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也成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反思革命主体理论时使用的关键概念。葛兰西将“霸权”定义为统治阶级通过意识形态、文化、制度等获得被统治阶级的自愿认同和支持。他认为,霸权不仅仅是强制性的控制,更是一种通过共识和同意来维持的社会秩序。这样一来,他就将霸权理论扩展到资产阶级的政治运作逻辑中,认为:霸权是统治阶级不断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的政治过程,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各自维护统治与争夺权力的有效手段,是必须依靠不断的斗争才能获得的;霸权总是处在一种动态平衡中,其中不断进行着对抗、协商、妥协、收编,因而暂时稳定的社会状态也会存在潜在的抗争因素,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常常处在一种相互纠葛的复杂状态中。就此,葛兰西强调,党的任务不仅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局部利益,要实现真正的社会变革,还必须超越狭隘的阶级利益,建立一个更广泛的“人民意志”,将不同社会阶层联合起来,形成一种生产性的联盟。通过这种方式,无产阶级才能摆脱资本主义世界观的侵蚀,并形成自己的反霸权“社会联

盟”,创造一种革命的意识去反对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及其意识形态。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视为对经济还原主义和阶级还原主义的重要矫正,强调了文化、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威廉斯认为,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涵盖并超越了“整体社会过程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霸权是一种整体社会过程,“它是一种由经验、关系和活动构成的现实复合体,带有特定的、变化着的压力和限制”<sup>①</sup>。霸权是复数的,整体中存在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存在主导阶级和从属阶级的意识形态,二者处在不断斗争和协商的动态平衡中。这一概念适应了当下发达社会的组织和控制过程,更加强调取代霸权的力量的重要作用,从而有助于更有效地动员革命行动。霸权概念的引入使威廉斯的文化观念有了明确的行使主体,他以此来分析主导文化、新兴文化、残余文化等文化构型,进而分析文化的结构性问题以及如何建构与保持文化领导权问题。

#### (二) 借用“从属集团”的概念深化阶级斗争的内涵,壮大文化政治变革中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

新马克思主义认为,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只将产业工人视为革命主体,这种革命主体理论无法充分反映现实社会变化所需的阶级力量和社会运动实际的阶级构成,也无法充分回应现实社会的民主要求。基于这种理论的斗争模式不再能够将个体困境提升为集体政治意识,从而难以凝聚能够有效推动社会变革的统一力量。安德森认为,社会主义政党若要重建政治影响力,必须构建一个新的“历史集团”,该历史集团应由多个社会群体和利益群体组成,通过共同的政治目标实现联合,从而赢得广泛而稳固的民众支持。霍尔认为,统治阶级的霸权总是受到其他社会群体的质疑,因而不是不稳定的。因此,有必要摒弃对社会阶级的固有定位,以更广泛的“从属集团”来反对“权力集团”,“矛盾的中心线是人民对抗权力集团,而不是‘阶级对抗阶级’,文化领域就是围绕着这一中心线实现两极分化的。尤其是大众文化,就是围绕着‘人民力量与权力集团’这一矛盾组织

<sup>①</sup> [英]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页。

起来的”<sup>①</sup>。霍尔进一步指出了传统的阶级主体理论及其阶级分析模式在现代背景下的局限性,强调不同社会力量可以结成新的联盟以对抗现有的权力结构。一是传统的阶级分析模式不再能够准确描述当代的社会、经济或文化现实。这种分析方法过于依赖经典的阶级划分理论和斗争模式,从而忽视了现代社会中身份的多重性和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二是传统社会变革模式具有局限性。这种模式无法恰当地反映推动变革所需的阶级力量和社会运动的实际构成。传统的阶级划分理论在塑造当前复杂且矛盾的阶级关系方面确实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及新的劳动形式的出现,若仍简单地将这些社会问题归结为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二元对立,以及与此对应的意识形态模式,就会忽略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复杂性,低估多元社会力量的作用,而且也无法全面反映出当前社会面临的民主困境。三是传统的阶级主体理论难以有效动员大众力量,激发主体的革命积极性。它忽略了当前新兴的多元化的社会运动,忽视了其他受压迫群体的利益诉求,因此,难以吸引大众力量的广泛参与,限制了其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四是这种“自动化”的阶级观念存在自身的局限性。这种理论认为,经济条件的差异可以直接转化为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差别,忽视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复杂而多样的中介过程,以及文化、身份认同等因素的作用。对阶级概念的这种简单化理解背离了马克思的深刻洞见。<sup>②</sup>霍尔的这一观点深刻反映了现实社会中阶级认同的变化,也表明社会主义者需要对这一变化作出回应。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从工业资本主义向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变,传统的阶级认同形式正在逐渐失去其主导地位。个体不再仅仅通过阶级身份来定义自己,而是渴望摆脱旧有的那种僵化和过时的阶级界定,追求更加多元和个性化的认同方式。由此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号召,在充分发挥产业工人作用的同时,应积极发挥知识分子、少数种族、少数民族、女性等群体的作用,通过跨阶层、跨行业的合作,通过少数群体在利益共同点基础上的联合,夺取革命领导权,以推进现实的社会变革。

### (三) 恢复“人民”作为革命主体的能动作用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重新阐释了“文化”一

词,将之视为权力集团与人民力量之间进行谈判和协商的场域,人民大众不再仅仅是结构主义范式下消极的被决定者,而是文化政治的解放对象。这意味着,他们不仅是反抗者,更是变革的主体,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能力。由此人民大众被赋予了更多的能动性和解放的可能性。通过文化实践,从属集团可以表达自己的声音,提出自己的主张,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改变现有的权力关系。霍尔提出了电视话语的编码/解码模式,用以阐释主导意识形态如何通过媒体得到传播并被受众接收。他将重点放在不同的解码方面,特别是在意义内涵必然具有的多义性方面。霍尔认为:“传播过程中对文本内涵意义的多样性解读并非源自传播过程本身,而是植根于社会结构的深层矛盾,反映了不同社会群体在经济、政治与文化生活中的结构性冲突、张力与谈判过程。”<sup>③</sup>大众对同一新闻或电视节目的不同解读,并非简单的“误读”或信息接收的偏差,而是一种深层的、根植于社会结构的意义协商甚至对抗过程。这种差异性解读在本质上是不同社会群体基于其阶级地位、文化经验、种族身份、性别立场和生活处境对媒介信息进行的主动诠释。也就是说,媒体在制作节目时通过特定的“编码”过程将主流意识形态嵌入其中,但观众在“解码”时并不必然会接受这一预设的意义。霍尔进一步指出,大众中始终存在着冲突与对抗,这种对抗不仅体现在公开的政治斗争中,更广泛地体现为对媒体话语、流行文化符号、个体生活方式的选择与重新诠释。它表明,普通民众有能力在意识形态的渗透下保持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并通过创造性的文化实践表达自身的立场与诉求,从而彰显出大众文化中蕴含的积极的抵抗力量。霍尔在此基础上提出,人民大众作为革命主体的能动性并不必然表现为有组织的阶级革命行动,而更多地体现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与权力结构之间的协商、对它的抵抗以及对文本与符号

<sup>①</sup> Stuart Hall, “Notes on Deconstructing ‘the Popular’,” in Raphael Samuel ed., *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 Routledge, 1981, p. 238.

<sup>②</sup> Stuart Hall, “Realignment; for What?” *Marxism Today*, Vol. 29, No. 12, 1985.

<sup>③</sup> Stuart Hall,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 in Ann Gray & Jan Campbell eds., *CCCS Selected Working Paper Volume 2*, Routledge, 2007, p. 396.

的主动解读。这就拓展了革命主体性的内涵。展现革命主体性的场所不再局限于工厂或议会等传统政治空间,而是延伸到文化、媒介与日常生活中。通过这些微观层面的实践,人民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并彰显了自身的主体能动性,为更广泛的社会变革积蓄潜在动力。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现实的阶级统治形式的霸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前统治集团的重点是控制工人阶级的行为和活动,而现在的重点则更多地转移到控制他们的意识上。追求解放的主体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人阶级与边缘群体走向联合,这些群体在社会中处于不同的位置,遭受不同程度的歧视和不公。因此,必须通过建立广泛的联盟,形成共同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的力量,以便能够真正推动社会变革。尽管边缘群体的力量相对较小,难以形成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和工人运动,但仍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意识和文化氛围,为现实的社会变革积累能量和提供新的可能性。

## 结 语

“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最新发展是与其本土的社会政治生活和全球政治形势联系在一起。”<sup>①</sup>面对新的历史现实,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基于唯物史观,重新思考阶级、身份、文化与社会变革之间的辩证关系,不断适应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矛盾的复杂性,构建了面向新的社会发展的批判理论与实践路径。

首先,文化研究向阶级视角回归,将政治经济学作为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基点。伊格尔顿主张,通过重构革命主体和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重新激活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维度。一方面,他批判了后现代主义去政治化的主体理论,指出后现代主义主张分裂的、去中心的主体。在他看来,这种理论将主体解构为语言、欲望或微观权力的产物,消解了集体的阶级行动的同一体性基础,导致政治行动陷入局部抗争,无法撼动资本主义的整体结构。而真正的政治变革需要具有共同目标和阶级意识的主体,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概念,只有通过阶级同一性才能凝聚革命力量。另一方面,他反对后现代主义对“元

叙事”的全盘否定,认为这些宏大叙事是理解社会矛盾的关键。社会生产与再生产、阶级压迫、殖民主义等“元叙事”并非虚构,而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在上述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伊格尔顿主张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维度。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将政治斗争转向文化符号、性别身份或语言游戏,是将“革命”等同于话语解构,实则是放弃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与政治制度的挑战。这种“文化主义”倾向使后现代主义沦为“无害的批判”,无法触及资本权力的核心。因此,必须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强调革命必须指向物质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的变革。他借用葛兰西的“阵地战”概念,认为文化斗争需与工会运动、政党政治、经济政策等实践相结合。伊格尔顿试图重构一种更具历史深度和实践力量的社会主义叙事,强调资本与劳动的对抗仍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只有通过制度变革才能实现人的真正解放。社会主义必须以阶级政治为枢纽,并不断吸纳生态、性别等议题,在复杂的现实社会中重新找到社会变革的方向及其所需的凝聚力。

其次,重塑马克思阶级理论的现实解释力。英国新马克思主义重新界定了当前条件下工人阶级的范围,强调阶级力量在反抗资本主义中的核心作用,同时主张工人阶级应与其他受压迫群体联合起来。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并没有消失,他们仍大量存在于资本剥削的链条上,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对立仍然是社会现实,工人阶级仍然是实现社会变革的主体性力量。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分析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认为当前人们对阶级的分析将“阶级结构视为一种阶梯,在这种阶梯中,不同的社会群体根据其地位、职业或收入占据着高于或低于他人的社会位置”<sup>②</sup>。但这种基于社会学的分析视角难以解释历史发展的真实状况。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仍然是剩余价值的源泉,因此,基于剥削的阶级对抗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这一点不会因为工人阶级的收入水平、主体身份、从事职业的不同而发生改变,对此马克思主

<sup>①</sup> 复旦大学哲学院主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7》,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

<sup>②</sup> Alex Callinicos & Chris Harman, *The Changing Working Class: Essays on Class Structure Today*, Bookmarks, 1987, p. 5.

义的阶级分析理论仍具有真正的解释力。卡利尼科斯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首先需要深化和更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的目标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他的杰作《资本论》中，马克思发现了它的结构逻辑。资本主义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也应如此。”<sup>①</sup>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下，阶级属性的界定在本质上是一个结构性分析问题，其核心在于揭示个体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客观位置。马克思明确指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sup>②</sup>这种界定方式超越了职业类型或收入水平的表象，直指社会权力关系的物质基础。因此，马克思所说的阶级基础并没有消失，工人阶级仍然是进行社会革命的主要力量。我们应将阶级概念从基于地位、身份、消费等阶级处境的社会学描述转变为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哲学范畴，拒绝对阶级理论的消解与排斥。

第三，直面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重新将生产方式分析作为基本研究策略，寻求超越资本主义的现实路径。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时，卡利尼科斯指出：“资本主义本身连同其主导思维——一种剥削和竞争性积累的逻辑——才是问题的关键。新自由主义，通过剥开资本主义表面上能够为人接受的机构和行为，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缺陷上。这些缺陷已经根深蒂固，只有推翻资本主义才能将其扫除。”<sup>③</sup>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体制的病理学症候根源于其本体论层面的价值增殖逻辑，这种以剥削性积累为内核的资本运行机制逐渐暴露出其不可调和的矛盾性。新自由主义导致资本积累体制的结构性悖论以更加彻底的方式成为现代性批判的靶子。新自由主义推崇“消极自由”，其背后隐藏着对主体间性关系的系统性消解。这种对原子化个体的理论预设，不仅为资本的空间扩张扫清了伦理障碍，更在哲学层面完成了对集体解放可能性的祛魅。当尤尔根·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殖民化”进程达到临界点时，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修复机制将达到其本体论界限——此时的社会变革已不再停留于分配正义层面，而是必须直面生产方式的根本性重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通过重新强调经济基础、阶级分析和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矛盾，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中的革命实践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范围内的反资本主义斗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总体而言，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性与重要性主要体现为，“持续在英国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背景下发展与诠释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对既有观念进行重新解读与批判”<sup>④</sup>，同时始终以人的解放和社会秩序的变革作为其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旨归。其所有争论主要围绕同一个问题展开，即从不同角度寻求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他们以人民主体思想为核心，以激发革命主体的能动性为价值目标，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主体理论。其主体思想并非简单复制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主体概念，而是基于二战后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特征，将革命主体从传统工人阶级扩展至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形成了具有英国特色的“人民”范畴。这一理论上的突破既保留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精髓，又创新性地融合了文化批判与结构主义方法，构建了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更具包容性和能动性的革命主体理论，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解放斗争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学术影响、政治实践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价值，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乔瑞金：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胡欣宇：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周艳辉）

- ① [英]卡利尼科斯：《列宁主义过时了吗？》，刘旭东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4期。
-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第426页。
- ③ [英]卡利尼科斯：《反资本主义宣言》，罗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 ④ Davis Madeleine, “The Marxism of the British New Left,”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Vol. 11, No. 3, 2006.

and administrative inefficiencies—it is imperative to accelerat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county – level integrated urban – rural development.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refining county – level urban – rural development planning, strengthening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promoting new urbanization, innovating diversified investment mechanism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mproving support systems for county – level industries that benefit local populations, and deepening reform of the rural land system and county – level governance system. These measures will help unleash new drivers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foster interlinked planning, collaboration shared growth, and coordinated governa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Looking from Below Upwards” :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ion  
of the People’s Subjectivity in British Neo – Marxism**

**Qiao Ruijin & Hu Xinyu**

British Neo – Marxism, oriented toward the realization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has pursued sustained reflection on core issues such as the formation of a revolutionary subject under conditions of advanced capitalism, the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resisting capitalist domination, and the concrete trajectories of revolutionary struggle. Through this ongoing inquiry, it has gradually articulated a distinctively British, “looking from below upwards,” people – centered Marxist theory marked by several salient features. First, it seeks to rejuvenate progressive cultural traditions so as to reforge the class consciousness of the working class as the revolutionary subject. Second, it emphasizes conformity with the laws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reby enhancing the working class’s capacity for revolutionary agency. Third, it call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broad social alliances to strengthen the working class’s anti – hegemonic and revolutionary capabilities. Collectively, these effort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elaboration of a more inclusive and dynamic theory of the revolutionary subject under advanced capitalist conditions, thereby advancing both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and broader processes of social development.

---

英文摘要审校 童孝华